

秦腔在贵阳

■孙凤岐

秦腔在贵阳的发展演变，是一部跨越数百年的戏曲交融史。

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秦腔这一古老剧种一夜之间走进千家万户。那高亢嘹亮、激越悲壮的曲风和地道浓郁的陕西方言，直抵人心，大呼过瘾。

其实，早在明末清初秦腔就翻越秦岭落户贵阳，至今已二百多年。

乾隆45年(公元1780年)乾隆下旨云：“兹据伊龄阿复奏……查昆腔之外，尚有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这便是秦腔入黔最早的记载。

乾隆、嘉庆年间，秦腔在贵阳一带颇为盛行。据史料记载，当时贵阳的秦腔演出非常火爆，“豫升班”等戏班常在娘娘庙(护国路指月街一带)等地连场演出《烤火·下山》等戏，吸引了大量观众。豫升班是贵阳历史上的第一个职业戏班，演出剧目多，演出阵容强大，它将秦腔在贵阳的演出推向了高潮。

当时的贵州藩台李宗昉在《黔记》收录的《贵阳竹枝词》中生动描绘了当时演出的火爆场面：“板凳条条坐绿鬓，娘娘庙看豫升班。今朝似比昨朝好，烤火连场演下山。”这寥寥数语，勾勒出了一幅极具烟火气的市井观戏图：娘娘庙前，长条凳上坐满了盛装打扮的观众，人们争相观看豫升班连场演出的秦腔经典剧目《烤火·下山》。简单来说，豫升班当时在贵阳的演出场场爆满，好戏连台，一票难求。这一盛况，印证了秦腔在贵阳戏剧舞台上的绝对统治力。用当下的网络语言，秦腔在贵阳一度火爆出圈。

电视剧“主角”中男旦苟存忠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贵阳也有一个男旦，名叫杨宝儿。据清代戏剧评论家吴太初《燕兰小谱》记载，当时年仅十五岁的贵阳籍秦腔艺人杨宝儿便已登台献艺，其“素靛娇憨，有柔媚妮人之态”，很受观众欢迎。

杨宝儿年幼时离乡背井去到京城，跟秦腔大师魏长生学习秦腔，由于天资聪明，再加上勤学苦练，深得秦腔要领。趁每年回乡时，他还与贵阳的秦腔同行交流技艺，并将自己学到的秦腔剧目和梳水头(帖子)、踩跷履等特技传授于人。乾隆年间贵州学使洪亮吉在他的《洪北江全集》中，记有观戏诗文，其中一句“束素腰纤点履高”，可以证明魏长生独创的秦腔特技和剧目，已通过杨宝儿传入贵阳。

杨宝儿是清代乾隆年间一位极具才华的秦腔青年艺人，也是贵阳历史上见诸记载的早期著名戏曲演员。年幼成名，轰动京城，展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他的扮相清新自然(素靛)，既带有少女的娇憨，又有一种独特的柔媚气质，非常讨喜。当时的文人诗作形容他“莺莺呀呀燕喃喃，龇齿迎人媚态含”，其嗓音清脆悦耳，表演细腻传神，能够生动地刻画出女性角色的娇羞与可爱。

代表剧目《烤火》是秦腔《富贵图》中的一折，杨宝儿饰演女主角殷碧莲。这出戏在当时的贵阳极为流行，据史料记载，贵阳的戏班曾连场演出此戏，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秦腔并未在贵阳孤立发展，而是与本地民间音乐、民歌小曲以及后来传入的弋阳腔、楚调等声腔相互交融。这种多元文化的碰撞与吸收，最终孕育出了独具地方特色的“贵州梆子”。从咸丰、同治时期的“豫升班”“万和班”，到后来的“泰洪班”“隆庆班”，贵州梆子戏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上世纪50年代初，贵州扬琴艺人就曾用扬琴曲调为秦腔剧本《穷人恨》配曲，道白使用贵州方言，很受欢迎。在扬琴基础上形成的文琴戏曾吸收过贵州梆子的部分锣鼓经和表演身段，以丰富的舞台表现力，开创了黔剧的先声。

秦腔在贵阳的发展演变，是一部跨越数百年的戏曲交融史。从明末清初传入贵阳，到与本土文化融合孕育出“贵州梆子”，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对新兴剧种“黔剧”的启发，以及当代作为文化交流名片频频亮相，可以说秦腔与贵阳有不解之缘。

回望历史，秦腔在贵阳的流传不仅是一段戏曲传播的佳话，更是贵阳城市文化包容与创新的缩影。它从北方的粗犷豪迈，逐渐浸润了西南的温婉细腻，最终化作滋养黔地艺术的甘霖，为后世贵阳戏剧舞台的姹紫嫣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亲慕

■王灏

缘分根植于烟火人间，相亲旧事如一条温厚的线索，串联起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乡土民俗与时代变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豫东乡村，到九十年代云南军营，一次次相逢与擦肩，既是我个人的人生际遇，也映照出数十年来婚恋观念、民风习俗的流转更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亲算得上是青春萌动期一件满含憧憬的美好愉悦之事。我的家乡在豫东平原，那时乡村约定俗成：十五六岁便有人说媒相亲，实属寻常；若年过二十仍未定亲，邻里多有议论，家人亲友也难免焦虑。婚配困难的家庭，偶有换亲、三转亲等，也是特定年代里的无奈选择。

我的相亲经历，集中在初中后期、高中阶段，以及军校毕业之后。十四五岁读初中时，有人上门说媒，在乡邻眼里是件体面事。因还在上学，相亲多安排在周末。出门前换上一身整洁衣衫，揣上两包香烟，听父母交待一番后，就跟着介绍人，骑着自行车前往女方村落。这时，女方的长辈与乡邻早已在家中聚集等候。每次面对这样的场景，年少的我难免会拘谨，往往赶紧规规矩矩行礼数：拆开一包香烟敬遍众人，余下的摆在堂屋桌上。再依主人安排，坐在靠门光线明亮处，接受询问与打量，一场朴实的“面试考察”便开始了。

交谈间适时从身上掏出另外一包烟再敬发一圈，言行举止、品性气度，尽收对方眼底。只有过了家人这一关，才有可能得到与姑娘短暂相见的机会。说是见面，无非就是在女方家人眼皮底下短短聊几分钟。遇到害羞的姑娘低头少语，往往还没看清模样，见面就结束了。讲究挑剔些的人家，不只看男方本人，还要看男方家境，明里暗里打听家风与人品，甚至不打招呼地突然到男方家里实地查看，当时叫做“相门户”，我家也曾遇到过几回。

八十年代中后期，豫东乡村订婚礼数颇多。订婚送帖是其中具有郑重承诺契约意味的重要环节，红纸墨字写清男女双方姓名、生辰八字等基本信息及吉祥祝福语。一场订亲，男方通常要花三五百元，置办二三十件成衣或布料，有实力、讲排场的男方还购置“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大件作为彩礼。由媒人协调男女双方家人择定吉日，携彩礼上门下帖。礼成之后，女方会安排较为信任的亲友与双方媒人到男方家赴订婚宴，双方加起来也就一桌一二十人吧。男方对订婚宴极为重视，多是自家备料、请乡厨操办，菜肴丰盛，宴席从正午延续到深夜，办得郑重体面。

从初中后期到高中，前后四年间，我经历了十余次相亲，大多顺利通过女方家庭的“面试考察”。让我印象较深的有两次订亲：一次是初二那年，大姑家儿子，年长我许多的表哥介绍一位名叫小甜的姑娘，女方体谅我在读书、家境一般，只要求二十来件衣物，未办酒席便算订亲了。后来她家中长辈盼其早嫁，而我一心求学，婚期难定，这段缘分便不了了之。另一次是高二时，同学的父亲热心牵线，介绍一位在县绣花厂做工的姑娘，我和她哥还是相互认识的初中校友。1989年我高考失利，女方父亲虽然仍支持这门亲事，但姑娘却以沉默表明态度，决然分手。此时，相处已近两载，心中不无遗憾。其间还遇见过同校不同班的同学，青涩相逢，终是擦肩而过。

1990年初，我告别故土，远赴云南参军。军营磨砺心性，也迎来了新的相亲缘分。按规定，战士不得在驻地谈恋爱，我便专心投入学习与训练。1991年入党，1992年考取沈阳炮兵学院，1994年毕业后到部队任排长，终于可以堂堂正正谈婚论嫁。在异乡先后结识两位女青年，皆遗憾收场。第一位是研究生，即将毕业，父亲执教，母亲在工商部门工作，家中姐妹二人，妹妹即将结婚。相亲当日，我与当时也任职排长的战友同去，女方父母热情挽留我们吃了饭。其母性格直爽，希望我尽早转业回地方工作，还流露出赡养老家父母可以钱物为主、不必接来同住，并以参加其妹婚礼作为应允的信号。归队途中我与战友商议：刚转业便谈转业，赡养方式也难认同，思量再三，只好作罢。

任排长时，还见过一位在云南某著名国有企业机关工作的姑娘，容貌端庄、待人得体，相比我的单纯，其阅历丰富。相处一段时间后我才知晓，她曾有过一段数月的短暂婚史，却始终未向我坦诚相告。以诚相待是相处之本，这份隐瞒让我心生芥蒂，两人最终不欢而散。

几经辗转，良缘终至。在营长热心撮合下，我认识了一位刚从学校毕业、父母在铁路系统的姑娘，小我六岁，性情相投、心意相通。没有繁复彩礼与陈旧俗套，营长夫妇郑重登门女方家，一顿家常便饭，便定下终身。那年我二十四岁，一身戎装，满心笃定。二十七岁，在团副政委证婚下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三十岁，一对双胞胎女儿降生。平淡烟火里，军旅生涯多了几分温柔暖意。

回望今昔，满心感慨。当年几百元彩礼、几身衣物，便可缔结良缘，风俗淳朴、心意纯粹。如今时代发展，婚恋成本攀升，动辄数十万元开销，成为不少家庭的重担。城乡婚恋格局也悄然改变：乡村适龄男青年择偶不易，城市单身女青年日渐增多。

步入网络与智能时代，社交方式日新月异，两代人婚恋观念亦形成鸿沟。长辈仍守传统，频催婚育；年轻人崇尚自由、追求独立，晚婚、不婚渐成选择，观念碰撞时常发生。

幕幕相亲画面，半程人生往事。乡村的青涩初见，军营的真诚相守，都是岁月赠予的珍贵记忆，是个人的青春，也是时代的缩影。人生不能重来，亦不可重新做选择。珍惜遇到的美好和善良，忘却经历的误解与委屈，这是人人都应该有的生活态度。释怀前行，余生才会更幸福。惟愿世间有情人皆得良缘，烟火人间，岁岁安然！